

清华名家之清华精神（二）

王小朱 主编

目 录

华罗庚：天才出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	1
梁启超：刻苦勤勉，孜孜不倦.....	3
吴宓：为理想而奋斗	15
蒋南翔：坚实的创新者	40
蒋君：把知识变成财富	68
张君：用困难磨炼成功	111
冯君：清华园中的管理者	154

华罗庚：天才出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

1931年8月，华罗庚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清华园。这是一位身体瘦弱，面有“菜色”，患有严重腿疾的青年。熊教授立刻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谈话中，他才思敏捷，对答若素。“一匹典型的千里驹”，熊教授很快便作了结论。

到校后的第一个难题，是给他定个什么职称。最理想的莫如给他个助教的头衔。因为在当时的清华做一名助教，实际上就是一名在职研究生，对于进一步培养、深造是十分有利的。但具体到华罗庚，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以他的一点微薄的学历（初中毕业），在家乡做初中教员尚且遇到人事上的重重困难，何况是一名大学助教！所以考虑再三，只能安排他先做一名系图书馆的助理员，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在当时，通常一个大学毕业生初到图书馆也只能是这个职务，而一个初中生通常的职称只能是“见习生”之类。但这一切对华罗庚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跨进最高学府的大门了。在这里，在完成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旁听大学课程，业余时间还可“自由”进出图书馆，当时的清华大图书馆，是办内有名的“宝藏”之一。这好比打通了一条通向数学王国的路，华罗庚开始了他的探索行动，俗话说：“一切事物都怕时间，时间惟独怕天才”，以后的事，就看华罗庚的努力了。

华罗庚以极大的毅力来对待他所面临的困难，拖着一条病腿，每天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整理图书资料、收发文件、代领文具、绘制图表等等。工作之余，他就去听数学系大一的课程。据后来有人回忆，在数学课方面，熊先生本来安排他去听解析几何课。他后来对人说：“当时解析几何对我来说太浅近了，即使熊先生的分析班我也可以听懂，不过，当时因为初到学校，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有些话是不便直说的。”人家问他：“你当时的数学程度究竟有多高？”他说：“有些问题已经了解到如数学系三四年级的程度，有些地方则尚差一点。”但熊先生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做法，免修他的解析几何课，而允许到自己“分析”班上听课了。在“业条”，华罗庚如饥似渴地阅读清华大图书馆所藏的中外数学书籍。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徐贤修：《悼念华罗庚先生》）而实际上，他初到清华时，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却远不止12小时。当他离垂清华赴英留学时，清华图书馆所有的数学藏书他几乎都读完了。

哈达玛和维纳，是当时清华数学系所聘的外籍数学大师。哈达玛(Jacques Hadamard)，法国人，熊先生称他是“国际数学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来校时是巴黎大学教授、国家数学院会员、世界数学会副会长、世界数学教育委员会会长，据说他还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所以介绍华罗庚读苏联学派的研究成果。维纳(Norbert Wiener)当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控制论专家，他来清华是受数学系和电机系合聘的，即同时在数学和电机两个系开课。当时清华数学系人才济济，许多后来第一流的大数学家当时都在清华作过研究生或助教，两们国际大师能够对一位“助

理员”投以青睐，是足以说明一切了。

华罗庚有一句名言：“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终于在熊庆来先生的力荐下(据说熊先生曾以去留问题在校委会上力争)，于1933年被清华聘为正式助教。有位校友感慨地说：‘须知助理员是职员系统，在当年的清华，由职员系统调任至教员系统，几乎为不可能之事。然而华先生打破了清华的这个相传多年的传统。’

梁启超：刻苦勤勉，孜孜不倦

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的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作例子，梁启超自己就足以说明问题。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痛苦环境中，仍本防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艰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见杨复礼：《梁任公年谱》)

与此过人之精神相辅成，梁启超也具有超人的毅力，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利用时间

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也不肯空息时日。在病床上，他“尤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接着，他又发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病榻读诗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以为可得著述之助，随不俟痊愈，携书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如是者凡七日，至十月十二日，病躯实不能支，乃搁笔卧床。旋又赴北京医院，随以不起”。（同上）他“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十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逾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同上）。

梁启超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尚且如此刻苦勤勉，不肯虚度时日，我辈更应虚心多学，自强不息。

□身体力行，严格教学

可爱的清华，知识与精神的富足之地。在这里，感谢清华的一代代教员，正是由于他们的严于治学，忠于教育，由于他们的勤奋敬业，无私奉献，众多的学子们才得以成为优秀的人才，国家的栋梁。

清华建校伊始即实行“强迫运动”，即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时，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沉重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但这时的“强迫运动”只是一般号召加行政命令的强制，锻炼时间内仍有人躲在树阴、墙角等幽静的地方读书，而到操场的人也不一定是认真地、科学地锻炼。马约翰来校以后，一到锻炼时间，他就拿着小本子重叠处寻找，不是为了

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锻炼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他经常按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别编组，有计划地做些矫正项目，引导他们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既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效果。

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 15 公尺、100 码 13 秒，跳远 14 英尺、游泳 20 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他严格照章办事。著名的文学教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马约翰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彻底，1952 年，学校中有一批结核病患者，集中住在一幢宿舍内，以不动或少动为主，有的是绝对卧床。长期的病房生活使他们精神很苦恼，有的人意志消沉。马约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找校医院大夫联系，对病人施行“体育疗法”。他到病房对大家说：“肺不是纸做的，动一动撕不破的！”每天和大夫一起来病房，根据不同病情组织不同的活动，逐渐加大活动量，后来有的人可以打羽毛球和排球了。经过一段体疗，加上药物配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病人都有好转，有的痊愈后恢复了工作或学习³。特别是在精神上，使病员们都建立了康复的信心。

马约翰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工作热忱，普及体育，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体魄健全的人才。他常引以为

骄傲的是许多学有成就的校友在校读书时都是体育爱好者，如前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在校读书时是三个中距离赛跳项目的全校冠军。

在教学上，国立清华大学以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在教育思想上受“自由教育”（“通才教育”）影响颇深，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改办大学之后，学校继承了清华学校时期治学严格的教学作风。清华大学的教师多是严师、良师，教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许多重头课，特别是基本课程，要求很高。例如“静动力学”，被学生称之为“天下第一关”。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对学生的作业、实验、实习、绘图等基本训练，都有严格的要求。考试很多，考题很难，严禁作弊。淘汰率很高，理学院、工学院沉重的淘汰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最低也在30%以上。在学生中养成了用功勤学的作风，在四年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一生受益无穷。

从清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虽经艰难、曲折和战乱，但由于清华师生深谙教育的基本规律，又负报国之志，更兼振兴民族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教者严于治学，学者勤奋读书，教学相长，确立了清华大学在国内作为名校的地位。名校、名师，也造就了一批成名的学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从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建立，到1948年清华园新生，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2549人，并选派了一批留美公费生，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佼佼者。

在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建校初期，还是在二三十年代学校顺利发展阶段，或者在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清华始终以执著的爱国精神和严谨的学风教育莘莘学

子，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不仅为祖国培养了一代代优秀学者，而且涌现出一批批民主斗士和人民解放的先锋。不少清华学子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永垂不配的烈士。

吴有训(1897—1977)

字正之，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高安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南昌二中任教一年。1921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入学，攻研物理学，深受其师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A.H.Compton)教授的器重。1925年起担任助教，并随康普顿从事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其间，为证实“康普顿效应”作出了贡献。

吴有训于1927年回国，初任江西大学筹委会委员，半年后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31年曾代理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一年。1934年后，任物理系主任，至1937年。抗战后，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并担任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清华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3年至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至1948年底。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教育部长等。1950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政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主任。长期致力于X射线对原子气体的散射研究，与康普顿合著《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钨kd射线的波长》。

号桐荪，教育家和数学界老前辈，清华大学数学系创办者之一，江苏吴江人。

郑之蕃于 1905 年考取江苏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攻读数学，得学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2 年学成回国，先后执教于南洋公学、安庆高等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曾担任安庆高等学校教务长及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监。在安庆时，与苏曼殊、沈燕谋共事，合编《汉英辞典》与《英汉辞典》。

1922 年夏，郑之蕃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为高等科讲授《高等微积分》、《复变函数》等现代学课程，他是在清华学校中最早讲授数学的中国教授。1925 年 5 月，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郑之蕃即根据学校的规划，着手筹办数学系。1927 年，清华数学系正式成立，他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为该系的创建和课程的开设，付出了不少心血。当时全仅有教授二人，即他和熊庆来。1928 年清华学校发展为清华大学，熊庆来担任系主任，郑之蕃乃专心致力于数学。1934 年夏起，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一年。抗战期间，郑之蕃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仍是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回北平，仍为数学系教授。1952 年因年老退休。他在清华执教 40 多年，教学认真负责，深得同学们的敬爱，著有《微分方程初步》和《四元开方释要》。

郑之蕃既是数学界的老前辈，又是诗坛名人，遗著有《吴梅村诗释》、《宋词简评》等，作诗论诗都十分精彩。退休后，常与其妹夫柳亚子相唱和，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著名物理学家、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亚栋，号仁杰，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922 年 5 月毕业于清

华学校，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吴士脱大学，1924年获斯坦福大学工学士学位，1925年任吴士脱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师，1927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在西屋电机制造公司任工程师一年。1928年回国，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1937年6月接任厦门大学校长，在其主持下厦门大学一跃而为东南著名学府，被李约瑟称为“加尔各答以东最佳学府”，荣获三等景星勋章。1944年赴美讲学，任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校访问教授，1945年回国途中又讲学英国牛津大学。1945年9月回国，应聘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47年8月，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著有《普通物理学》、《普通物理学实验》、《交流电路》、《交流电机原理》等书。

吴晗(1909—1969)

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杰出历史学家，坚强民主战士，优秀共产党员。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精于明史。他热爱祖国，痛恨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中，与闻一多等并肩战斗，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1946年随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一边执教，一边在教师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多次起草教授们的宣言和声明，揭露国民党的独裁与反人民。1948年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离校奔赴解放区。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主要著作有：

《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读史札记》、《灯下集》、《海瑞罢官》等。195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动乱中，遭“四人帮”残酷迫害，1969 年 10 月 11 日含冤逝世。

熊庆来(1893—1959)

字迪之，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云南弥勒人。早年就读于云南方言学堂(后改称云南高等堂)及英法文专修科。1913 年赴欧留学，进入比利时包芒学院(Institut Paumant)预科，1915 年后相继就读于法国格洛诺布(Granoble)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Montpellies)大学、马赛大学等校，获理科硕士学位。1921 年回国，初为云南工业学校及路政学校教员；同年秋任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

1926 年秋，应聘到清华，担任数学系教授。1928 年起担任系主任，直到 1937 年夏。他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主要创建者之一，载誉海内外“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担任清华数学系主任任期内。1931 年作为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1931 年至 1933 年，在巴黎专攻函数论，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

1937 年秋，出任昆明云南大学校长。1949 年夏，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会议，遂留巴黎做数学研究工作，不断有论文发表。1957 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研究员、研究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等。

钱三强(1913—1992)

原名秉穹，浙江吴兴人，杰出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员。1937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伊莱纳·居里教授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菲来德里克·约里奥教授领导下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直到1941年。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3—1948年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研究室进行研究工作，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起，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6年曾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钱三强对原子能科学技术的突出贡献，是发现了核反应三裂变。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中国科学院秘书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致力于原子物理研究，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

这些，只是这一群体中的少数几个，近一个世纪以来，清华就是秉承着严格教学的精神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人材。

□以民族发展为己任

自强不息，以民族发展为己任，又是清华人的一个任务，从清华的前身开始，民族精神就始终贯穿着清华

学习的赤诚之心。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从清结的历史变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爱国精神。

清华学子的血是热的。他们身在高等学府，心与人民大众紧紧相连，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蹂躏东北、虎视华北、妄图亡我中华、侵占全中国的危急关头，清华的先觉者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震撼人心的吼声，鼓舞着大批爱国青年积极投身于“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许多热血青年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杨学诚、黄诚、纪毓秀、凌则之等革命者为了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姚依林、宋平、蒋南翔、荣高棠、李昌、张承先、康世恩等则在爱国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和骨干。

清华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呼吸共患难，这是孩子对母亲的感情，每个清华人都知道自已的责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大学辗转南迁。先在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再迁至云南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三校风云际会，和衷共济，艰苦办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栋梁之材，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永志难忘的一章，三校之间也结也有了很深的友谊。

西南联大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校风和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和全国人民一起广泛、深入地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胜利后，面对两种前途、两种命运，联大师生深感内战威胁，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1945年11月26日，联大宣布罢课，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和南菁中学教员于再、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烈士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一二·一”运动教育了人民，促进了各阶层人士的觉醒。闻一多教授本来是一位“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学者，在事实的教育下“折案而起”，成为民主的斗士。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教授(七君子之一)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闻一多把个人的生死置于度外，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我们要准备像李公朴先生一样，前足跨出了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倒在特务的枪下。闻一多宁肯倒下，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9页)。他的道路，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道路。

闻一多的精神，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清华人说：我们都不能丢掉这种精神。因为他是民族的火炬，会永远照耀我们前进。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联大正式宣靠结束。联大期间，三校师生精诚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和衷共济，献身教育事业，开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我的联合办学之先河，深为教育界、科学技术界人士所赞誉。联大建校后，曾作校歌一首，以鼓舞全校师生在艰难的岁

月里同仇敌忾，为国分忧，为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造就栋梁之材，其歌词极其悲壮；寄调满江红也大有深意；联大结束之时，为纪念教育史上这一空前的壮举，三校共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回顾了三校南下联合办学的艰难历程，阐明了联大办学的宗旨、精神、作风和成功的经验。其碑铭则在痛定思痛的痛史既逝之后，对未竟的事业充满希望。现将联大校歌歌词及联大纪念碑碑铭录之如下，以飨读者：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铭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臬，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从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办学方针、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教学作风与战前基本上一脉相承，保持了清华的治学精神和文化特征。复员之初，校方曾力图重整旗

鼓，恢复战前清华的繁荣，然而南京政府意在“剿共”，将教育置于脑后。由于当局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闹得兵荒马乱、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教育经费短缺，师生员工的生计难以维持，复兴清华往日的优势难以实现。

由于南京政府倒行逆施，局势日趋恶化，全国经济崩溃，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华师生顺乎历史的必然趋势，投入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行列，爱国进步力量日益壮大。名重我国文坛的学术大师朱自清教授，虽然贫病交加，但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其高风亮节，表现了我国民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清华学者的“正气歌”。

今天，清华学子在国内外依旧风采如初。中共现职领导人中，有不少是清华学子，朱容基、胡锦涛、吴邦国、彭佩云、黄菊、朱森林、吴官正、肖身份、王汉斌、傅锡寿、陈士能、田成平、伍绍祖、曾建徽等都是清华大学的民族精神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之中，一天天被发扬光大并为清华的发展凭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

吴宓：为理想而奋斗

季羨林是吴宓的门徒。他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深刻表达了吴宓先生身上万岁理想而奋斗的闪光之处。即便季先生本人，也不失为进取的典范。

“……总之，他是一个即奇特又矛盾的人。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畸人，是一个